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系列

本书基于“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在理论上研究了三个突破，即“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YUEP项目扶贫经验借鉴、基于宅基地的土地利用创新。这是一个系统创新，争取为贫困山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



*Endogenou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s
Mountainous Areas*

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

周永广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

周永广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 周永广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308-08702-5

I. ①山… II. ①周… III. ①乡村—旅游业—可持
续性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5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2265 号

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

周永广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文字编辑 徐霞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76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702-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一

周永广博士寄来他的著作《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嘱我作序。我从1999年主持桂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在考察龙胜梯田后意识到社区参与旅游对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始关注社区旅游的研究，之前虽然早在1995年就看过Peter Murphy的名作*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但始终没有将社区旅游作为自觉的研究内容。从桂林之后，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对社区旅游做了较多研究并在各地的规划中尝试设计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在有的地方已经起到作用。因此，在初步翻阅了书稿后，我感到周博士在社区旅游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当即表示很高兴为本书写点感想。

知道周永广博士是在2004年我主持黄山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工作时，看到他写给市政府的关于黄山古村落发展的建议报告，后来知道他在黄山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到日本读博士，主要研究乡村旅游。从日本回来后他到浙江大学旅游学院任教，并继续他的研究。期间，他到浙江省遂昌县挂职当县长助理，在那里他开始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倡导农民入股、分工合作、自治经营的“遂昌公社”乡村旅游模式。

几年前在研究中西方社区参与旅游的差异时，我们曾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土地所有制不同。

周永广博士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比如，他在研究了乡村旅

游地发展的两种模式,即景区附近的农家旅馆(真实的农户+无维护的乡村景观)和企业运作的古村落或农庄(虚假的农户+有维护的乡村景观),指出前一种模式会造成“公地悲剧”——旅游资源过度利用、公共品牌受损;后一种模式则经常表现为与农民争利。在解释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时,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农民基层组织活力缺失、政府或企业对村落利益的侵占、“公地悲剧”等问题。个人认为,“农民基层组织活力缺失”这一点是周博士新的发现,之前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可能跟他挂职的经历有关。

又比如,关于“社区主导”型发展的研究,周博士认为,仅仅“居民参与”或“社区参与”是不够的,农民分散独立经营的“社区参与”往往导致产业弱质化。在中国,必须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主导”,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户”模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社区控制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村民从旅游业中公平受益,有助于解决社区的贫困。

再比如,对于利用农民宅基地建乡村度假屋的“联众模式”的探讨,周博士认为,“联众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农家乐”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革命,是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

类似的观点和发现还有不少。

当然,本书由于是由若干份相对独立的研究报告组成,各章还带有明显的独立成篇的痕迹。但总体而言,这是一本有研究发现和知识贡献的专著。值得一读。

保继刚*

2011年1月24日于广州

*保继刚教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兼任中山大学校长助理。

序 二

浙江大学搞乡村旅游研究的人比较多,但知道周永广老师是比较迟了,因为他一直在做旅游规划,在报纸上常看到他的规划项目得到第一名,但是没想到,他也在潜心研究山村旅游。

山村扶贫也是我们 CARD 中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2005 年,我组织翻译的《发展经济学的革命》探讨了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包括山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发现,对于如何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还有很多课题要探讨。

本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内生式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学缘关系。我们一直在引进外国学术理论和观点,但是没有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内生式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自力更生”。

本书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内生式发展”模式,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出发,以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制定决策的有效基层组织为切入点,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历程,并且将自身的实践概括为“公社模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有着较深厚的理论创新。

本书第二个重要观点是,“旅游经营权”归属于土地所有权的权利束,没有法律规定其单独存在;地方政府没有资格出让集体土地的“旅游经营权”。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地方政府经常在违法。

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来探讨组织的有效性很有趣。农户分散独立经营的“社区参与”往往导致产业弱质化,最过分的案例是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公司+农户”模式往往缺乏深层次的合作,结果居然是公众受骗、公司倒闭、农民受损。这导致了本书的第三个重要观点,即必须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户”模式,走向“社区主导”(Community-Led),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社区控制能力,才能有助于解决社区的贫困。

本书第四个重要观点,指出山村常常是被资本遗忘的角落。即使有了外来资本,也往往忽视农民的利益。可以说,目前的外来资本对山村社区发展的无效,使得扶贫资金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联合国在云南的 YUEP 项目,在当地成立“社区共管组织”,放手让村民决定扶贫资金的用途,值得大家更多地关注。

这本书还有很多推论和创新,在此不一一列举。案例很新鲜,多是永广自

己的一手资料；理论富有创意，也经过几个地方的实践，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编出来的东西。我看中的不仅仅是书中提出的系统创新——一个理论：“内生式发展”模式；三个突破：“社区主导”型发展机制+小额贷款制度创新（如 YUEP 项目经验）+基于宅基地的土地利用创新（如“联众模式”），而是笔者十年磨一剑，从博士论文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潜心研究山村和山村旅游，终于结出硕果，精神可嘉。

黄祖辉*

2011 年 2 月于华家池

* 黄祖辉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主任。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研究总论	1
1.1 研究的切入点:为什么选取山村?	1
1.2 本研究的意义	1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创新	2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4
1.4.1 山村的窘境	4
1.4.2 “农家乐”内在发展机制的探索	6
1.4.3 “社区主导”(Community-Led)型发展	8
1.4.4 从山村旅游到山村社区复兴:途径探索	9
1.4.5 系统创新:“社区主导”型发展+YUEP 模式经验+宅基 地“联众模式”	13
第 2 章 山村的窘境	15
2.1 “山村”的定义	15
2.2 山村发展的窘境	18
2.2.1 山村的基本状况	19
2.2.2 山村衰退的政治解读	20
2.2.3 山村衰退的经济解读	26
2.2.4 山村衰退的文化解读	33
2.3 山村旅游开发的窘境	34
2.3.1 山村旅游的“个体户模式”及其弊端	35

2.3.2 山村旅游“开发经营权出让”模式及其弊端	38
2.3.4 山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6

第3章 内生式发展:山村发展的内在机制 49

3.1 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	49
3.1.1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现实背景	49
3.1.2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内涵	50
3.1.3 内生式发展模式对于山村发展的作用	57
3.1.4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欧盟“LEADER”项目	58
3.1.5 结论与展望	61
3.2 实证案例:“农家乐”发展机制探析	62
3.2.1 “农家乐”的发展机制与内生式发展模式	62
3.2.2 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	63
3.2.3 “农家乐”内生式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	64
3.2.4 浙江长兴顾渚“农家乐”发展实证研究	69
3.3 乡村旅游地社会网络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73
3.3.1 社会网络	74
3.3.2 组织公民行为	75
3.3.3 组织有效性	75
3.3.4 案例简介	75
3.3.5 两个案例地的结网特点	76
3.3.6 两个案例地的结网特点总结	85
3.3.7 两个案例地在各变量上的表现	88
3.3.8 社会网络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机制概念模型	90
3.3.9 结论与启示	91

第4章 从山村旅游到山村社区复兴:途径探索 95

4.1 基于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开发	95
4.1.1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和社区主导开发的对比研究	96
4.1.2 社区主导模式的三种基本类型	98
4.1.3 不同类型社区主导模式的对比研究	102
4.1.4 结论	105

4.2 YUEP 项目发展的经验及其移植的可能性	107
4.2.1 山村扶贫与发展问题回顾	107
4.2.2 研究方法	114
4.2.3 案例实证分析	114
4.2.4 讨论:YUEP 项目成功的模式及原因	122
4.3 宅基地利用的创新:“联众模式”	131
4.3.1 理论回顾	132
4.3.2 现实问题	133
4.3.3 研究问题推演	135
4.3.4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135
4.3.5 实证研究	137
4.3.6 实践启示	148
第 5 章 山区的整体性旅游开发:两个案例	150
5.1 基于内生视角的古村落群旅游开发——以皖南古村落为例	150
5.1.1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研究现状	152
5.1.2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理论框架	155
5.1.3 黄山乡村旅游国际示范区应用案例分析	156
5.1.4 对三种开发模式的评价分析	163
5.1.5 小结	165
5.2 遂昌的试验:“公社模式”、网络营销和自驾车旅行	166
5.2.1 现有农家乐模式在山村应用的三重困境	166
5.2.2 实证案例研究:遂昌县的探索和实践	168
5.2.3 讨论与启示:山村旅游的内生式发展之路	172
第 6 章 其他个案研究	174
6.1 黄山西递与宏村:两个世界遗产村落的对比	174
6.1.1 案例研究背景简介	174
6.1.2 基于“内生式发展”的山村旅游开发模式——以西递村为例	175
6.1.3 基于“外源型发展”的古村落旅游开发模式——以宏村为例	178

6.1.4 中国古村落旅游的“公社化”开发:一种新的概念化模式归纳	182
6.2 白洋淀“岛村”:旅游“真实性”和社区化发展	187
6.2.1 相关理论回顾	187
6.2.2 白洋淀“岛村”:旅游社区化发展的案例分析	191
6.2.3 白洋淀岛村旅游社区化发展的意义	194
6.2.4 结论和研究展望	195
6.3 基于 ANT 理论的浦江仙华山村的实证研究	195
6.3.1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196
6.3.2 实证研究	197
6.3.3 讨论、启示与展望	202
参考文献	206
本研究已发表论文	220
后 记	222

第 1 章

研究总论

1.1 研究的切入点：为什么选取山村？

山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69%，山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绝大部分贫困县集中在山区。相比于平原地区的乡村，我国许多山区农村已经处于衰退之中，山村贫困、山区生态维护等问题紧迫。

第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道路阻塞、经济落后、生态系统日益恶化、文化衰退、人口结构老化、人口外流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山村的发展。山区维护和山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研究热点，2002 年被命名为“联合国山岳年”(the UN International Year of Mountains)。

第二，我国平原地区乡村的发展，已有了一些模式和途径的探索，如通过城镇化的发展积聚农民人口；通过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乡村经济。但是，山村在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和平原的区域差异性非常大，虽然目前东部发达省份通过“下山移民”、“高山有机农业”等措施，解决了少部分山村的发展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发展山村的抓手少之又少。

第三，山村往往是水源地，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点保护区，遗存着较多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有着良好的旅游发展前景。发展山村旅游业被认为是一种阻止农业衰退、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乡村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

1.2 本研究的意义

关于“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在国内尚无先驱性研究。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内生式发展”，最初是由瑞典 Dag Hammarskjöld 财团在 1975 年向联合国总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① 而概念的五个基本要点之一“自力

^①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

更生”(Self-reliant),来源于毛泽东思想(转引自日本《经济协力用语词典》,1996)。笔者认为,“内生式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学缘关系。

相对于中国城市地区的外源式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农村地区经济区位优势不足,基础设施缺乏,面临衰退的危机。尤其是众多乡村人口已经在大量外流。因此农村地区不仅需要扶贫资金,而且必须建立适合自身地域特点的开发战略。本研究试图通过乡村旅游业的“内生式发展”,为占我国国土面积69%的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投入资金,而且应该通过扶持政策和机制的创新,使得“旅游扶贫”从传统的输血式的模式,走向农村基层组织主导、农民深度参与、经营能力提高的造血机制,使得山村有着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目前农民组织涣散、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造成的“中央热、地方冷、两眼望上”的不利局面。^①

内生式发展的内涵(鹤见和子,1996)^②:

(1) 地区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地方基于内部的生长能力,同时保持和维护本地的生态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文化多样性。

(2) 为了实现(1)所表述的目的,最佳的途径是以当地人作为地区开发主体,使当地人成为地区开发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3) 为了保证(2)所描述的途径,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并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决策制定的有效基层组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各项措施的实施。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创新

笔者自2000年撰写博士论文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乡村旅游,本书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2006年,笔者结合在浙江省遂昌县挂职县长助理的机会,倡导农民入股、分工合作、自治经营的“遂昌公社”乡村旅游模式。此模式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由基层自助组织统一经营,不需要家家办执照,也不需要家家开餐厅,形成产业链。即一个“农家乐”村庄只有一个对外营业窗口,变个体经营为集体经营,成功避免内部杀价;只有一个或几个食堂,其他农户经营适合自身的多种产业,实现综合效益,成为社区综合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农民,弱在没有有效的组织。但同时,笔者明确反对20世纪50—80年代给我国带来灾难的“集体主义经济”,因为其实质就是计划经济或权力经济,由于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行统一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几十年的

① 李昌平. 新农村建设需要四大制度性突破. 学习月刊, 2007(7).

② 鹤见和子. 内生式发展论的展开. 日本筑摩书房, 1996.

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低效率。“遂昌公社”的本意,不是“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有效的组织和市场营销。

同时,在笔者的其他规划(黄山市乡村旅游国家示范区规划、杭州市西湖区新农村建设规划、温州市乡村旅游规划等)当中,“内生式发展”作为指导思想之一,也做了比较多的实际应用,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和赞许。

总结自身实践,笔者同意 Ryan“当地人应参与旅游管理,分享权利和旅游带来的利益,这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观点。^① 笔者认为,相对于经济、环境、社会三大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关于“机构”(Institution,如民间组织、社区惯例等)的研究远远不够,而包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四圈观点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21世纪议程》所采用。^② 笔者从 CSD 的观点出发,认为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目前我国山村旅游研究的重头戏(见图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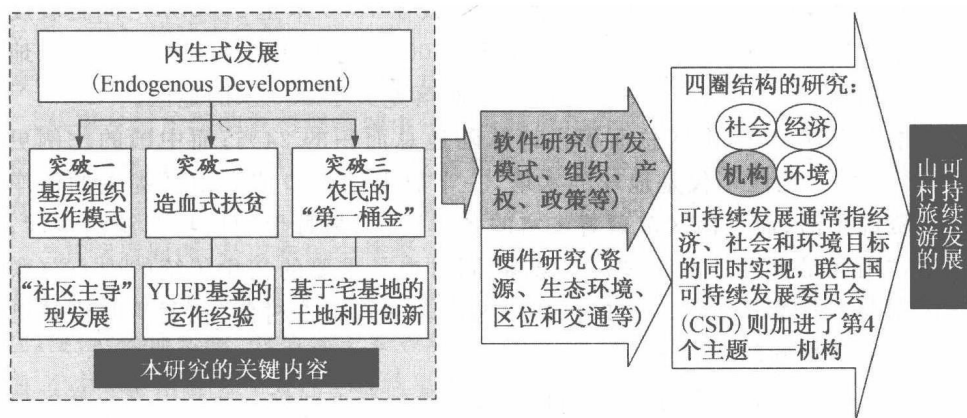


图 1-3-1 本研究在“山村可持续发展”中的定位

针对多个研究对象,我们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模型、案例、问卷、对比研究、规划应用等),围绕着“内生式发展”理论展开。首先,我们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探索“农家乐”内在的发展机制。其次,通过对比研究,解释社区主导模式(Community-Led)的三种类型。再次,通过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云南的 YUEP 项目和浙江联众休闲产业集团的公寓式乡村度假项目进行案例分析,试图为山村农民挖到“第一桶金”。总结自身实践,笔者认为,“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扶贫资金的运作模式、基于宅基地的土地利用创新,是目前进一步发展我国山村旅游可持续发

① Ryan C. Equity, management, power 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issues of the “new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1).

② Robert P A. 怎样判定可持续性.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通讯, 1999(6/7).

展的三大突破。最后,通过黄山市古村落群和遂昌县两个乡村旅游规划,完整展示了一个山村区域的整体开发设想,其中有些规划内容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笔者就如何促进山村旅游业乃至整个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分以下几个专题展开了研究。

1.4.1 山村的窘境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0年关于“山区”的研究^①中,山区的范围是:①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地区;②海拔在1500米至2500米之间且坡度不小于2度的地区;③海拔在1000米至1500米之间且坡度不小于5度的地区;④海拔在300米至1500米之间且相对落差大于300米的地区。

根据上述定义,山区总面积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4%;而中国的比例更高,占69%。山区不仅是地球的水塔,一半以上的人口依靠山区提供的洁净的水资源生活;而且山区蕴藏着丰富的各类资源,是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宝库;同时,“山区是世界各国许多人的家园,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传统的中心”(联合国副秘书长德赛,2002)。以古徽州为代表的黄山古村落,在明清时代就已成为了中国贵族的聚居地。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山村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区位优势不利、经济落后、生态系统恶化、文化衰退、人口结构老化、青年人口外流等。2002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表明,全国的贫困村中有83%位于山区和丘陵地带。到2008年,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沿海平原地区经济发展迅猛,日新月异;而绝大多数的山村地区衰退不前,在窘境中挣扎,日渐凋敝。

关于山村衰退,很多学者做过政策和经济角度的解读。从政策角度来看,多年来政府的忽视,山村成为公共投资的盲区;农业政策、土地制度改革的失误,让山村发展进退维谷;而基层自组织的薄弱,又无力带动山村的内生发展。直到2005年“十一五规划”中,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这将是山村振兴的曙光。

就山村旅游这个小领域来说,尽管形式有很多,但我国的山村旅游是以“住

^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http://www.unep-wcmc.org/habitats/mountains/statistics.htm>.

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农家乐”为主。欧美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是乡村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在欧洲,甚至定位为“拯救欧洲乡村的乡村旅游”。^①同时笔者认识到,最需要乡村旅游的,是除了农业、林业、畜牧业别无他路,而又远离城市、生态良好、空气清新的山村。其一,传统社区氛围浓厚,当地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高,可协同性强;其二,开发中的资源成本相对低廉,有利于效益最大化。

这些年山村旅游地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即景区附近的农家旅馆(真实的农户+无维护的乡村景观)和企业运作的古村落或农庄(虚假的农户+有维护的乡村景观)。这两种模式,前者没有保持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Rurality),后者没有满足旅游者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体验,笔者认为,距我们心目中的诗意乡村生活还相差太远。^②

但是,目前以农民个体经营为主的“农家乐”呈现出两个表征:其一,以“吃”为中心,同质竞争严重,低水平建设,低价格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村庄的和谐发展。如村落从一种纯朴而本色的经营转变成一种极其商业化的运作;以家庭为单位蚕食和侵占公共资源;房屋建设涌向旅游公路两侧;邻里失和;等等。其二,从事乡村旅游的乡村逐渐城市化。乡村旅馆外观上已经丧失其“乡村性”而成为现代建筑的拙劣模仿,游客“吃餐馆饭、住小洋房”。既没有体现当地文化内涵,又很容易被复制。故而乡村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十分短暂^③。

其背后原因,是以农民个体经营为主的“个体户模式”造成的“公地悲剧”。由于旅游资源是公共资源,具有负外部性、强烈的责任规避与搭便车诱惑等特性,使得“公地悲剧”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失序、公共福利供给短缺,最终的结果就是山村旅游地的重要竞争资本——旅游资源过度利用、公共品牌受损。

而另一种模式,即企业运作的古村落或农庄(度假村),则经常表现为与农民争利,这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晓舒的报道“土楼抢夺战 世遗成了祸根”^④中,有着生动的描写。当年村民挖野菜吃树皮修复的福建南靖县土楼,成为了中国第36处世界文化遗产。本抱着大欢喜的土楼人,为了自己的“旅游经营权”而抗争,却被抓了。

我们在另一篇论文“黄山西递和宏村:两个世界遗产村落的对比”中,也就

① Briedenhann, Wickens. Tourism routes as a tool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1).

② 周永广,马金涛,吴茂英.基于“真实性”体验的乡村旅游社区化发展研究.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9(4).

③ 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遂昌县风景旅游局.遂昌乡村旅游规划,2006.

④ 陈晓舒,刘震.土楼抢夺战 世遗成了祸根.中国新闻周刊,2009-4-17.

“旅游经营权”的法律问题,做了探讨。结论是,尽管作为古村落旅游开发最为重要的吸引物之一的古建筑,其所有权属于农民私人所有(如古民居)或者村集体所有(如祠堂等公共建筑),但是单个农户却并不享有独立进行旅游开发的权利和能力。将“旅游经营权”收归集体,向旅游者收取统一的门票,并将所得收益的部分在社区内部共享,可以避免在收益分配、决策等问题上很多可能的冲突。更激烈的态度是,“旅游经营权”归属于土地所有权的权利簇,没有法律规定其单独存在;地方政府出让集体土地的“旅游经营权”,是地方政府在违法操作,尤其是村落自身成为景点的情形。

乡村旅游地出现的种种现状,和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不是因为资源和产品乃至市场需求,而是产生于农民基层组织活力缺失、政府或企业对村落利益的侵占、“公地悲剧”等问题。

1.4.2 “农家乐”内在发展机制的探索

在《农家乐发展机制探析》一文中,我们通过因果关系分析和流图结构分析构建起“农家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 Model),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仿真模拟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图 1-4-1 所示。通过模拟研究得证:“农家乐”发展系统主要由正反馈主导的第一阶段与负反馈主导的第二阶段两个阶段构成。其中,在第一阶段,市场与政府行为不是促进系统发展的必备因素,但能够对第一阶段起到显著的影响;在第二阶段,环境与市场对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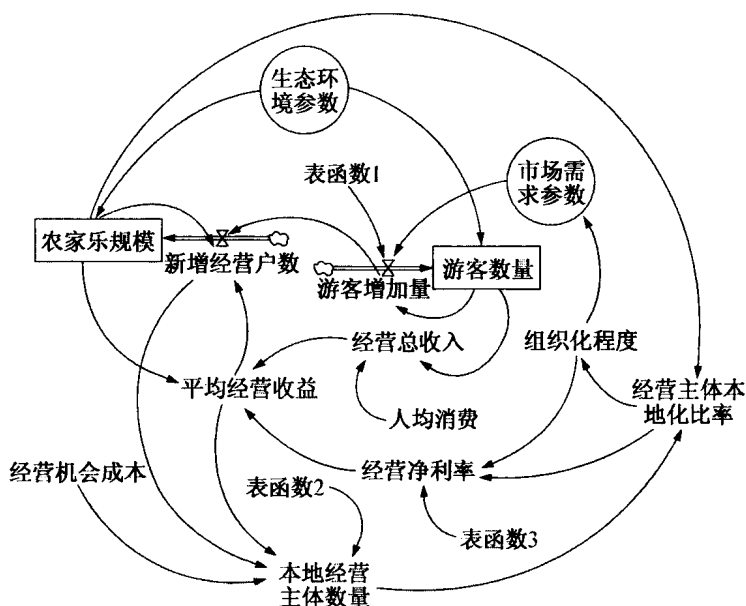


图 1-4-1 “农家乐”发展动态系统结构图